

年选
大系

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
ZHUANJI WENXUE

2003

中国年度最佳

蔡震 郑向前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传记文学



年选
大系

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
ZHUANJI WENXUE

2003

中国年度最佳

传记文学

蔡 震 郑向前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中国年度最佳传记文学/蔡震、郑向前主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 2

(2003 年选系列)

ISBN 7-5407-3104-4

I . 2... II . ①蔡...②郑... III . 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054 号

2003 中国年度最佳传记文学

主编◎蔡 震 郑向前

责任编辑◎陆汉波

封面设计◎罗 云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南宁华侨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340 千字

印张◎13

版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3104-4/I·1889

定价◎20.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红墙”里的摄影师杜修贤 / 1	朱 琴
“航天少帅”袁家军“神舟”放飞千年梦 / 8	吴志菲
彭德怀“八万言书”手稿	
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 17	彭梅魁口述 周燕撰稿
陈赓大将的最后岁月 / 26	马京生
王盛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 36	余 戈
营救冯雪峰 / 41	秋 石
从俘虏到战斗英雄	
——王克勤的人生传奇 / 48	王增勤
他在第一时间报告林彪坠机	
——访原驻蒙古大使许文益 / 60	阎 铭
苏联档案披露溥仪被俘和引渡前后 / 75	孙思源
读人笔记五则 / 87	黄宗江
孙海英: 执着岁月呼唤激情彩虹 / 99	刘淑娟
徐帆的“日子” / 116	阿 莲
陶红: 我的生活不做秀 / 126	蓝 柚

宋春丽：没有孩子的“母亲” / 136 李 蒙

邓亚萍：爱情还是初恋燃起的那把火 / 147 诺 亚

“火箭小巨人”身后的浓浓父母情 / 156 刘荣林

沈从文：这个天才的乡下人 / 164 李 辉

沉默寡言的反抗者

——记 2003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 / 174 北 塔

在成长中寄托魔幻

——记《哈利·波特》之母罗琳 / 183 红景天

凌叔华：古韵精魂 / 197 傅光明

蒲团和福气

——我的童年故事片段 / 211 毕淑敏

赛珍珠：文化双视镜 / 220 朱 岩

周作人：日暮的哀凉 / 229 孙 郁

甲子人传 / 238 蒋子龙

叶公超其人 / 246 张昌华

“北大荒”的特殊美编——丁聪 / 258 赵国春

“上博”老馆长马承源 / 262 施宣圆 张晓敏

潇洒风流总出尘

——记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 / 273 杨小武

钩沉学海 猎逸书林

——记一代史学宗师陈垣 / 287 周骥谷

戴逸：一生跋涉为清史 / 297 李 相

衡宇相望成梦忆

——怀念一氓先生 / 309 范 用

有容乃大

——袁运甫与中国当代公共艺术 / 313 陈池瑜

英若诚人生之旅 / 326 梁秉堃

三宝：成功的音符因拒绝而嘹亮 / 344 兰宁远

“钢琴诗人”傅聪 / 353 杨 荔

昔日曾为“阶下囚”

——郭沫若被日本警视厅拘捕的来龙去脉 / 366 蔡 震

另一种活法：从白领丽人到私人农场主 / 378 董月玲

白修德：一位美国记者的中国情结 / 387 张建安

他最先诊断出 SARS

——记以身殉职的世卫组织医生乌尔巴尼 / 396 周有恒

才嘎与他的可可西里 / 404 顾炳枢

“红墙”里的摄影师杜修贤

朱 琴

最先听到杜修贤这个名字，是通过《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这本书。

《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中有记载，杜修贤，是父母赐名，杜山，是周恩来赠名，杜秀咸，是江青送名。又听说，他跟随周恩来到过30多个国家，在毛泽东身边也有10年左右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凡是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新闻图片，大多出自他手。

后来，一次座谈会上，才真正见到杜修贤，人称“杜老爷子”。俨然一老者，不仅白发，身体也硬朗，1.80米的个子不减当年，还有蓄意留起的白胡子，他会不时地抚摸两下，欣然问人“好看不好看”。问及他的年龄，大概77这个数字，无论怎样颠倒，也不会是其他，但他却满脸坦诚有意减去10岁：“去年我67岁”。许是“红墙”里工作太久，言语间也是少却许多繁冗。简洁地直来直去，有点不谙世故。其实，面对他时，就是无话可说，你也会在他众多的传世之作中略知一二。

恍惚走神时，似看见陕北的黄土高坡上，贫瘠的山梁间，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上，那是行走的杜修贤。带着他的年轻和山那边一定不是山的梦想。向南向南……那一夜，他走了80多里路，也走出了他的故乡——米脂县。

偶然间，在绥德县，这是和米脂邻近的一个县，从几个穿灰色

制服人的嘴里知道“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正在招收学员，杜修贤又喜又忧。喜的是遇到了八路军，忧的是身上没有钱，还不识字，就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传来一声：“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当勤务员吗？”虽然他不清楚勤务员是什么，可又怕机会溜走，于是不停地点头：“会，我什么都会做，留下我吧。”这是一个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年龄不大，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他给了杜修贤希望，杜修贤可以留在学校里当勤务员了。

真正痴迷摄影，是师从吴印咸之后，是有了“蔡斯”相机之后。而走进中南海，来到周恩来身边，是他36岁那年。1960年，侯波、孟庆彪、张彬还有杜修贤，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的摄影工作。那时，他已有了16年的摄影经历，显现出特有的杜修贤风格。

初春的一天，众人相约在位于京北的“王府家庭农场”。这里是杜修贤的新家。周边屋宇错落，地阔庭美，有人拾地种菜，红绿昂扬，一派田园风光，猫狗也安然，真是生活的好去处。同时，这里也汇集了杜修贤77个年头的“绝代风华”。一排排装订在册的底片、照片悄然屹立。随手翻来，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壮观，“红墙”里的风起云落在这一隅突然沉寂了许多，惟有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幅照片，向人诉说着他的“昨日辉煌”。坐在书房的沙发上，仿佛置身一个“领袖”辈出的年代。那些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时刻和运筹决策的伟大人物一一与你擦肩而过，他们“谁主沉浮”的英雄气魄，让人感慨万千。只是，蓦然回首，天地相隔，伟人无言。

在杜修贤的家里，有两张周恩来和他的合影。一张是周恩来与他握手的照片。那是在颐年堂前，颐年堂是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地方。那天，毛泽东有外事活动，周恩来较其他领导同志早到了。杜修贤看见周恩来正在和电影记者握手，他抢先几步拍下了这组镜头。这时，周恩来看见了杜修贤，走过来同他握手。突然，周恩来转过身对其他记者说：“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同时，周恩来转

向另外一个记者，拍拍手说：“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如今，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杜修贤的书屋里。另一张照片是杜修贤与周恩来并排坐在飞机的座椅上。在杜修贤跟随周恩来的日子里，不论走到哪个国家或是什么时间，为了第二天国内各大报纸能及时配发新闻图片，不能休息。一次，已是深夜两三点钟了，周恩来来到杜修贤的住处，周恩来看到他还在工作，便关切地问：“怎么不睡呀？不困吗？”杜修贤拿出一瓶小白药片给周恩来看，说：“吃了这个就不瞌睡了。”周恩来看了一眼，摇摇头，说：“你跟我一样，不要多吃，多吃了人会上瘾的……”

好景不长，1966年7月1日，杜修贤跟随周恩来的专机从罗马尼亚回来，刚下飞机，他就被接送到了新华社大院，成为审查对象。罪名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特务、间谍”。之后，他被下放到车间当了一名定影工人。

但是，杜修贤的厄运还没有到底。1968年，杜修贤被“流放”到乌鲁木齐一个叫铁列克提的小镇。其间，周恩来多次问有关人员：“老杜有什么问题，你们批斗他？”“他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而远在边疆的杜修贤，在他的心里，同样也牵挂着周恩来，他相信周恩来一定会帮助他摆脱困境。

终于在1970年，周恩来要出访朝鲜时，看到出访人员的名单上没有杜修贤的名字，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至此，周恩来才知道杜修贤还在新疆。“叫他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周恩来说。于是，一封加急电报命杜修贤立即回京。就在他离开铁列克提的第二天，苏联在我国边境制造了流血事件，那几个记者同行，连及他们的魂魄永远地留在了那里。此时此刻，谁又能体会杜修贤那种难言的无助和痛苦？相知有谁？比如周恩来。杜修贤不幸之中大为庆幸，成为“文革”以来，周恩来、邓颖超在西花厅后厅里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在此之前，也是周恩来指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新华通讯

社在人民大会堂大厅举办了一次“我国领导人访问十四国新闻图片展览”，展览中的新闻图片大多都是杜修贤拍摄的。乔冠华提议，新闻图片上可以写上摄影记者的名字，周恩来同意了。

有人问：“杜老爷子，‘红墙’里边，有没有是你最最刻骨铭心的？”杜修贤说，当然有，他说的这个有，一定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辞世。那时，他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组长，负责拍摄毛泽东的照片。在这样一个最后时刻，杜修贤曾多次近距离地为“安详”的毛泽东照相，其中，有两次，是他不能忘记的。

9月10日晚上11点多钟，杜修贤在人民大会堂布置悼念毛泽东的吊唁活动的拍摄工作，杜修贤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困了乏了，就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此刻，距离几天的吊唁活动还有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后，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至这里，明天还要拍摄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场景，想到这里，他准备坐在大厅的沙发里休息一会。朦胧间，耳边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老杜，你带上相机跟我走”，他睁眼一看，是汪东兴。当时，杜修贤身边没有带照相机，但他想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任务，他向其他同志借了一个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匆匆赶往汪东兴处，汪东兴问他：“你带了几个卷？”杜修贤说三个卷，汪东兴又说“不够，多带一些胶卷”。杜修贤又去找别人借了几卷。随后，汪东兴对他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杜修贤跟汪东兴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杜修贤坐上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车子快速地驶进了中南海，但汽车没有驶进游泳池，而是停在另外一处院子里，下车后，杜修贤才知道，这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里的另一处住宅，和游泳池相邻。杜修贤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里面只有沙发和茶几，不一会，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给杜修贤端来一杯热茶。大约有40分钟的时间，杜修贤突然听见一声门响，随后几个人的脚步悄声走来，他看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从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华国锋一边走一边剔牙，看样子他们像是刚刚吃完饭，

这时他才意识到，已是9月11日的凌晨了。姚文元看到他时，对他说：“老杜，我们到处打电话找你，还以为找不着你呢？你来了太好了，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你先带老杜去，我们一会儿就来。”姚文元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杜修贤跟着这个工作人员后面，穿过走廊向北走，在一间北面房的门口，工作人员停了下来，对杜修贤说：“就里面，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进去了。”杜修贤应了一声，就一个人往房间里面走，一进门，杜修贤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他怔住了，毛泽东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睡着，周围一片宁静。杜修贤想，是要他来拍照毛泽东的最后遗容？因为他知道，一旦毛泽东的遗体运到人民大会堂的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放进无氧罩里。杜修贤轻轻地调好焦距，他小心翼翼，生怕吵醒毛泽东。杜修贤把镜头对着毛泽东的遗体拍了一张半身的，又拍了一张全身的，他正拍着，身后传来门的响声，他听见姚文元在门口关照警卫员，要他们把门关好，不准其他人进来。杜修贤放下相机，等待指示，这时，房间里已陆续进来了几个人，还是江青、张春桥等他们8个人，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商议什么，随后，他们几个人排成一排，脸上很是悲伤的神情。一个接着一个围绕毛泽东的床缓缓行走了一圈后，8个人排成一行，低头站立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直到这时，杜修贤才明白，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给他们拍照……出人意料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一个紧挨着一个，手挽着手地在毛泽东遗体前站立着，他又按动了几次快门。杜修贤想，叶剑英为什么没有来呢？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剑英副主席，如果说只是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医疗组成员。回到摄影部后，值班记者告诉杜修贤，说姚文元来过几次电话找他，杜修贤联想起汪东兴为此事亲自找到他，又想起江青的“你怎么就带来了一个闪光灯？还是平版光”的话，可见，为了这次合影，他们8个人是计划好了的。

9月17日下午，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杜修贤，告诉

他汪东兴让他马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去，汪东兴在那里等他。此时，毛泽东的吊唁活动已经结束。杜修贤叫上身边的一位年轻摄影记者同他一起去。一进门，杜修贤看见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都在里面，杜修贤和年轻的摄影记者进去还没有坐下，王洪文对杜修贤说：“毛泽东的遗体要运走，我们准备在无氧罩子里拍些照片，作为资料，以后用来对照毛泽东遗体变化。”王洪文又告诉杜修贤，那里面没有空气，你要戴上氧气罩进去，你戴上面罩练习一下，看行不行？这时，已经有人请示王洪文什么时候移运毛泽东的遗体，杜修贤说：“别人行我也行，就不试了。”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杜修贤氧气装备怎么用。并说，感觉呼吸不畅、憋气时，就用手拍拍装氧气的瓶子，望着这个陌生的东西，杜修贤一时无措，心里有些紧张，再去寻找那个同他一起来的年轻的摄影记者，已不见他的踪影。这时又有人告诉杜修贤，不要紧，有一名护士和你一起进去。杜修贤拿起照相器材，戴好氧气罩，和护士一起往里走，当听见第一道门在身后关闭时，杜修贤身旁的那个女护士也随即倒下，她晕过去了，她比杜修贤还紧张。进去以后会是个什么情景，杜修贤也不知道，但他想自己与毛泽东虽然不能说是朝夕相处，经常见面，为他拍照，也是影熟面详，杜修贤在心里边问自己到底怕什么呢？事后想想，其实是对一个没有空气的房间充满的恐惧。当推开第二道门，杜修贤再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安详的面容像是睡得很深很沉，看着“熟睡”的毛泽东，杜修贤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拍照了，他的泪水盈满眼眶，还有氧气罩里的雾气，杜修贤的视线慢慢地开始不清晰，眼前一片模糊，情急之下，杜修贤一只手拿着相机，凭借感觉，把镜头对准毛泽东的遗容，快速地从不同角度按动了多次快门，另一只手不停地拍打氧气瓶子，当杜修贤完成了拍照任务，走出第一道门时，华国锋握住他的手说“老杜，谢谢你”。王洪文说了一句“真怕把你也干在里头了”。杜修贤想，王洪文说的这个“干”字，是担心他因为缺氧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吧。这是杜修贤一生中

惟一一次在没有氧气的环境里为毛泽东拍下的最后的照片。

居住北京的人都知道，备战备荒年代，深挖洞广积粮不仅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也实实在在地遍布在京城地下的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毛家湾一带。只是这个地下与其他地下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为了保存好毛泽东的遗体，毛泽东的遗体从人民大会堂运到这里。杜修贤听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毛泽东的心脏比正常人的心脏大。

杜修贤指着对面书柜上的两只咖啡色皮箱子，不等他开口，有人问，是用这套器材为毛泽东拍照的？杜修贤说，不是，这两只箱子啊，我跟周总理走了多少地方，它们就跟着我走了多少地方，只要总理出访，我拿起它就走。说罢，他眼睛久久凝视着那两只箱子，没有移开。他一定在想，那里边有太多的周恩来的音容笑貌，尤其是杜修贤的那句“总理喜欢我”，是他最最亲切、肺腑的怀念之情。他喃喃地说：“总理是好人哪。”问，怎么讲？杜修贤说：“总理让我给他办过许多事情。”“都是些什么事情呢？”杜修贤只说了一句：“该我办的，不该我办的，他都让我去办。”众人默然，那些事情里边其实堆积的是周恩来对他的信任。

我说，你的一生挺辉煌的。他笑了，笑得似孩子，很满足。

杜修贤说，他离休后要做三件事，写书、出画册、办影展。那天，他一并把这三件事都摆在了我们面前，说，他都做到了。

“航天少帅”袁家军“神舟”放飞千年梦

吴志菲

1999年11月24日，江泽民到航天城视察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王礼恒临时决定让袁家军介绍情况。袁家军的介绍条理清晰、简明扼要，江泽民听后十分高兴地说：“这位年轻人才37岁，说明航天事业后继有人。”于是，在朱镕基视察航天城时，袁家军又担纲了全程讲解，又给朱镕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合影时，朱镕基特意问道：“刚才介绍情况的那位37岁的副院长在哪里？”

袁家军，“神舟号”飞船系统总指挥，著名空间技术青年专家。1962年9月出生于吉林通化，198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与应用力学系，1987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飞行器设计专业硕士毕业。历任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

——编者

2003年8月3日，首届“中国十大科技前沿人物”颁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四送“神舟”飞船上太空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袁家军入选其中。

（一）“东方”升起航天梦

1970年4月，当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飞过天际时，不到8岁的袁家军站在激动的人群中，听着收音机中传出的《东方红》，在长白山下仰望夜空。他好奇并焦急地问爸爸：“为什么看不到卫星呢？”父亲说：“快了，快了。”虽然还不知卫星为何物，但袁家军却觉得它是那般神秘，令人神往。

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时，袁家军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是——北京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中，他写了“不服从”。大学毕业前，恰赶上空军从大学生中挑选飞行员，袁家军顺利通过了体检及其他审查，同时他又考取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飞行器设计专业研究生。面对两种选择，他毅然选择投身航天事业。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是中国卫星设计与研制的核心部门。1987年，袁家军硕士毕业，到总体部结构实验室从事卫星立项前的研究工作。两年后，受院里委派，袁家军赴德国宇航院力学研究所研修。一年的研修结束了，袁家军回国。当时，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的一颗地球资源卫星刚刚上马。卫星总系统由双方联手，而结构系统则由巴西完成。由于巴西在技术与经验上还不够成熟，无法完成结构系统的设计与研制。于是巴西便将这个系统又反承包给中方。总体部结构实验室当仁不让地接下了这个任务。此时已被任命为室主任助理的袁家军负责整个研制的协调、组织与管理。

卫星的总体结构分为两个舱段，即服务舱和有效载荷舱，袁家军一人负责一个舱段——有效载荷舱的设计与研制。这对于他来说，强度和难度都是超负荷的。1991年夏天，卫星的结构大系统顺利完成，并在巴西空间研究院的专家会上一次通过。

1992年，“而立”之年的袁家军被破格提拔为卫星结构系统的主

任设计师和结构实验室的副主任，开始主持“实践四号”卫星的研制工作。

“实践四号”是为了发展我国的小卫星，并适应“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试验任务而上马研制的，虽是小卫星，但五脏俱全。卫星上的仪器设备近百台（套），光紧固件就达 3700 多个。按照设计要求，这颗卫星要运行在一条远地点为 3.6 万公里、近地点为 200 公里的大椭圆轨道上，因此卫星将长时间处于阴影区和无光照区，这无疑给测控、热控等各个分系统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作为负责人，袁家军肩上的担子无疑十分沉重——各个试验组出现的技术难题，都要一一汇总到他那里，由他组织各系统的专家、学者研讨攻关。

经过不懈的努力，“实践四号”顺利升空，并以其探测空间环境各种数据、搭载多个实验项目的辉煌业绩，揭开了原“风云一号”卫星在运行中出现故障的谜底，为我国开展新一代应用卫星的研制和新型航天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科学依据和物质基础。

1995 年 5 月，袁家军出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不久即升任副院长，并作为常务副总指挥，主抓我国最新型空间飞行器（宇宙飞船）的研究和设计。他组织制定出了一套适合飞船研制特点的工程管理办法，保证了飞船研制的顺利完成。1999 年底，他又远赴发射基地，精心组织，科学管理，奋战四个月，圆满完成了“神舟号”试验飞船的发射任务。

（二）怀疑声中挑重担

2002 年 10 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袁家军第四次领命出征戈壁。

这年冬天的戈壁滩刚刚经历一场罕见的大雪，发射阵地的气温下降到零下 27℃，对于屹立在发射塔架上的“长征二号 F”火箭和

“神舟四号”飞船来说，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12月30日凌晨，沉沉的黑幕笼罩着戈壁滩，只有发射阵地亮如白昼。高达100多米的飞船发射塔架环抱着“长征二号F”，就像一尊巨型礼炮遥望苍穹。火箭顶部是“神舟四号”飞船。飞船两侧，两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分外夺目。袁家军器宇轩昂地站立在戈壁滩的寒风中，大漠寒风阻挡不了这位年轻总指挥的满腔热情。

“……5、4、3、2、1，点火！”指挥员的口令刚落，发射场上惊雷声起。“神舟四号”发射成功，并顺利返回。站在飞船返回舱面前，袁家军百感交集。几年来，它的每一个部件，它的每一点点变化，他都烂熟于心。思绪一下子飞回到8年前，他带领试验队员为航天员打造第一个返回舱的时候。

那一年，年仅32岁的袁家军被任命为“神舟”飞船副总指挥、北京空间技术实验中心建设总负责人。在一片“不可能”的怀疑声中，袁家军走马上任，接过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当时，“神舟”飞船返回舱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研制中的重要一环。飞船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三大部分组成。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飞船的指挥控制中心。凭着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袁家军决定将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拿下。

返回舱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由于其体积大、外形不规则，局部焊接极易变形，必须慎之又慎；发动机的安装面和对接密封面精度要求极高，国内还没有技师做过；许多零件工艺要求复杂，但是国内连基本模具都没有……

那段时间，袁家军每周有两三天睡在办公室里，抓紧时间学习消化各种技术资料，力争把握住每个关键环节。他与研制人员制定出了长达5米的返回舱工作流程图，细心勾画了工作脉络，明确了所有关键技术的完成节点。他坚持每周在返回舱现场开调度会，把院士、专家和能工巧匠都请来当高参，现场有什么问题马上解决，决